

全球女性主义研究项目—口述史课题

时间：2002年12月22日下午

地点：中国 广州 全球工人与社区合作计划亚洲区域经理葛友俐办公室

叙述者：葛友俐

访谈者：张健 石彤

录音整理：王小平 陈琛 李晓晖

张：您现在，就是自我的这种身份的认定，性别的认定，确认什么样的性别？

葛：我想我很明确的认定我是女性。

张：女性？

葛：对。

张：那你的这种生理上的认定，是跟男人的相对的一种性别还是一种……一个其它方面的一个理念确定的这种身份。

葛：呃，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性别这个概念有两个认识吧，一个认识就是我们所谓的生理性别。那么，我个人呢，就是说我的这个生理性别是，无疑是女性，我自己这样是这样自我认定的。那么，呃，另外还有一个性别的概念就是一个社会性别，“gender”这样的这个概念。那么我觉得我在“gender”这个概念上面的性别认定也是女性，但是我这个女性是相对于传统的女性的社会性别概念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我的，就是行为，价值，价值取向，呃，思想层面。我对我自己的社会性别的认定，是有别于传统对女性的要求的，那么至于是什么呢？我在不断的探索、摸索当中。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我想有别于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性别，呃，行为吧，

对传统妇女的那种认定。

张：那，可以不可以这样称您是一个新的女性呢？

葛：可以，可以，呃。

张：您是否认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性主义者？

葛：我想我是女权主义者。之所以刚才要做这段说明就因为，我对女性在社会上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或者在家庭当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有一个新的，就是有自我的认识，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判别标准和一个追求，我想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的动力。而且，呃，我想这个追求是应该以两性平等，以及就是女性的一个独立的社会身份，作为我们的这种追求目标的...我认为是有这样一种理念的女性是女权主义者。我也在努力当中，所以我也认为我是女权主义者。

张：您这个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您这个女权思想或者这种追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发的呢？

葛：对，我记得，嗯，大概是在一九九六年，我曾经给我的一个朋友写了一句话，我的这句话呢，是总结我和她之间的，就是她，她作为我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一个同事，对我产生的一个影响。那么，我，我对她说的这句话，呃，就是你把我从一个自然的女权主义者变成了一个自主的女权主义者。就是说你把我从一个天然的女权主义者变成了一个有自觉意识的女权主义者。

张：您那天然女权主义者怎么理解？

葛：对天然的女权主义者就是我，我自己认为没有那么明确的这种意识，但是呢，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作为女性，我体会到了一种压迫感，我体会到了一种郁闷，我体会到了一种某种不公，但是我没有用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这种能力。（沉默）我只是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这种压抑感，我是从小就有的，而且我认为就我的这种压抑感是女性所特有的一种生活经历。哎，那么，哎。

张：能不能谈一下您的这个成长经历？

葛：如果我，对，如果我要是，那个，自己回顾一下我自己的那个童年哪，呃，其实我的这种压抑感是从我的童年就开始了。我的家庭吧，可能也比较有代表性。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我们两个人，年龄差着四岁，那么，我们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职业妇女，她就，她没有时间来照顾我们，那么就把我们两个人，我和我哥哥送到了上海，我的爷爷奶奶家。那么我的爷爷奶奶呢，是一个老式家庭的成员，所以他们对待我和对待我哥哥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那时候我可能只有三四岁，他们怎么区别对待呢，就是我哥哥可以白天都在外面玩，或者他去上学，或者上学回来以后就在外面玩，而我的奶奶从来，就是，限制我白天在外面玩的时间，然后，她就要求我跟着她早上出去买菜。我们四点钟，就是当年那个生活非常的艰苦，城市人如果要想买足够的那个蔬菜和肉类的话，就得早上四点钟去菜市场排队，尽管我很小，我不会做“买”这个动作，但是我在那儿可以占一个队，排一个位子。那么，如果我四点钟跟着她去，那么我可以在蔬菜的这个摊上占一个位子，她可以到肉类的那个摊上去占一个位子，然后等她买完了她再过来把我替下去，她再来买。我现在就记得就在四五岁的时候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跟着我的奶奶去菜市场排队，替她排队，当一个，呃，就是那个替，替身，哎。那么，这种事情，我哥哥是从来不做的。跟她买完菜回来，我就，她会要求我，跟着她摘，摘菜。就学，非常简单的，啊，摘菜。然后呢，等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她就要求我学那个缝纫，呃，就是缝，缝衣服，学纳的什么，呃，那个，纳，呃，纳线头啊，穿针引线啊，呃，然后就做最基本的针线活，哎，然后她的唯一的依据就是说，一个女人要做、学会这些东西，以后才能嫁得出去。所以，她就让我从四五岁开始就学过这些东西。那么，我就觉得，呃，就很不公啊，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做法。比如说，在那个桌上吃饭，他们永远是要我能够自律，就是说要把好吃的省给别人吃。这是做人的一个美德，她教育我的时候是做人的美德，所以要让家长先吃，要让别人先吃。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让我哥哥这样做，相反的是，他

们不断地往我哥哥的碗里头夹菜。

然后呢，就是最极端的，就让我最不能那个接受的一次。就是有一次，我们就一块出去，呃，那个，哦，有一天，就是我的奶奶，就是突然，就是说：我们出去吃雪糕吧！冬天啊，对于我们小孩来讲，就是冬天能出去吃雪糕是特别大的一次享受，然后我就兴冲冲的就跟着他们去了，去了以后呢，没想到我奶奶给我哥哥买了一根雪糕，给我买了一个四分钱的冰棍。然后，我当时，我就真的是特别的愤怒，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你给他买个雪糕，可能当时一个雪糕一毛二，但是一个冰棍是三分，完了以后，她就说因为他是男孩，当然应该让他吃有奶油的雪糕，而我只是吃一个冰棍。就这种委屈呀，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另外呢，我就觉得我哥哥对这一些做法的那种坦然、那种麻木和不知不觉，我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从来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妹妹吃的是一个冰棍，而他吃一个雪糕。我就觉得，就是今天在我回忆的时候，能够在冬天吃一个冰棍的乐趣是没有的，我的感受到我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回忆是对我的一种伤害。我就已经完全没有这种美好的回忆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对我的一种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是，就是他们这样公然的，对待我。我哥哥也是就是完全的麻木，他就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他是一个男孩，他就没有想到他比我大四岁，他作为哥哥，他应该照顾我，他没有，他特别坦然的就在那儿吃他的那根雪糕。尽管...但是我就觉得我现在我，而且我后悔很多年，我为什么当时就没有把这个雪，呃，冰棍给扔掉？因为我太爱吃了，所以我带着那种屈辱，还把那冰棍给吃了。我吃了以后我一直在后悔，我当年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待遇？我，而且我还把冰棍给吃了，然后我就不断为我这个行为感到后悔，我就认为我自己没有骨气，没有，真的没有志气，我觉得我当年应该把这个冰棍扔掉，向她表示我不满，我根本不能接受这种待遇、对待。但是我没有，因为小孩儿太馋了。（笑）在我们那个就是缺吃少穿的那个年代，冬天吃一根冰棍，本来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所以我还把这个冰棍给吃了。（笑）我，而且我很多年我对我自己（行为）不满。

葛：就是这样的经历，然后呢，呃，当然，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没有一直和我爷爷奶奶生活，等我上了小学了，就回到我父母身边了。我父母必竟是，呃，那个，解放以后受的教育，多多少少有一点新观念，而且我哥哥呢，他还是在我爷爷奶奶家，受着他们一惯的宠爱和呵护，那么，等我回到我父母家呢，我就是成了家里的唯一的孩子了，实际上在我父母那里也就没有机会再区别对待、再歧视我了，所以呢，我就得到了一份关爱。呃，我认为，就是，那是我真正体会到爱，体会到幸福的那个年代。那么，在我父母身边呢，一直，呃，到中学毕业，然后去上大学。那我觉得我上中学的时代呢，还是过得很无忧无虑。当时也没有什么考试的压力，然后我父母呢，非常的爱我，然后，呃，我在班上呢，呃，学习成绩也都不错，再加上我的性格也比较的开放。哎，我觉得我作为女性，我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压抑的这样的经历，我自己今天回忆起来也是觉得还是蛮无忧无虑的，而且我觉得我什么也不比男的差呀。所以还有一种，呃，就是一种自信吧，也有一份自信和那种自豪感。

但是，我觉得我的大学又变得很压抑了。（笑）哎，就是一种性别给我带来的那种压抑和困惑，就是到了大学要谈恋爱了。（笑）然后呢，就是女孩儿嘛，就是那个多多少少都以，呃，有男孩儿来追求，在男孩儿面前受欢迎，作为自己的一种，呃，一种认可。这种...这种，哎，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呢，我呢，是一个特别不受男孩欢迎的一个女孩儿。（笑）也许我太奔放、太...就是大大咧咧，再加上我长得不好看，所以呢，就是说，呃，我在和男同学的交往当中，在男性，和男生的交往当中，我觉得他们对我的那种冷淡和那种排斥，也是豪无顾忌的。

张：跟你的学业有什么关系吗？

葛：跟我的学业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在学校也不是什么优秀学生，那么，我觉得我可能，我，我后来我就六年，我在大学读了六年，四年本科，两年研究生。我这六年是在一种非常压抑和非常自我否定的一个状态下度过的。但是呢，就是我当时我就搞不清楚，我就认为这是我的错，是因为我长的不好看；是因为我可能不够温柔；不会去吸引男孩儿。所以我在不断的否

定我自己，男生在否定我，但是呢，我自己也在否定我，哎。

张：您这种否定是通过他人的语言呢？还是...

葛：通过他人的眼光。

张：眼光。

葛：哎，通过他人对我的态度和对我的这些做法。我，呃，知道我自己没有价值，这作为一个女的，没有价值，可能我是我认识的，就是说，而且我的例子还特别的极端，我是我知道的唯一的没有男人追求的女人。我自己一直困惑，我从来没有男人追求过我。然后，我就，我就觉得就是说，如果我，我是丑吧，我觉得好像跟我长的差不多的人也有人追求。然后，就，就是这种东西是我的青春期的一个，一个心病。我就百思不得其解，然后，我就越，就，那个，自己就不断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就是因为我长的不好看。所以呢，我就更觉得不公平。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一个女人的价值仅仅从，从一张脸上就能够把她所有的价值都否定掉呢。那么，当然这里头有两个误区，第一误区，就是说，其实女人的价值不是通过男人来体现的。就这一点，我当时不知道，我觉得如果没有男人来追求，这个女人就没有价值。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女，一个女人的价值和她的外貌有这么密切的，呃，关联性，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如果不仅仅是外貌的话，那可能就是我的性格。那么，我就研究，研究总结，那我可能，我不够温柔啊；不够，呃，风骚啊；不够体贴啊，我就不断的，呃，就是寻找我自己身上的这些不足，然后，甚至呢，想来改变，去迎合男生。当然，改变的，第一，改变的也不成功。第二呢，也没迎合到什么男生。（笑）

但是就是这种自我否定和自我压抑，就是这种压抑的程度是相当相当深的。所以说今天在我的心理深处也有负面的烙印，我到今天没有完全摆脱。

张：指的是什么，有没有主动的...

葛：没有，哎，你说主动的是吧，主动去追求，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也，我不会，主要是，

因为我的这种文化里也没有教育过我怎么去和，呃，吸引男，男孩儿。(笑)然后怎么去勾引男，男的，我也不会，另外，当时还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呃，这种影响吧，就是觉得好像去主动追，追男孩儿的也不是什么好女孩儿，(笑)我另外还想当一个人。(笑)所以呢，就，也，我，我自己也觉得我也没有这种能力，好像这种天赋也是不一样的。呃，就是，所以呢，我也，就是，我也不敢，第二个，我也不会。所以就造成了我的那样一个状况。(沉默片刻)再加上呢，实际上自卑心已经形成了，使得我也没有勇气再做什么主动的，呃，行动。所以，我就，我当时就想，反正我就认命了，如果有人来找我，那我就保证让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真的，我就甚至下，发誓，我说你们都瞎了眼，我想这些男人，我说我这么好的一个人。其实，我作为一个人，我自我认同是很好，我觉得我很善良，我很热情，我也很聪明，而且我还有，就是有思想。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这些价值不被认可，然后我心里面就发誓，我说，其实我的价值他们没有看到，那么，我要，我一定要让第一个来追求我的男人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笑)这样心里面就暗暗发誓。(笑)但是，就是，其实我想突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心理状态以及我当时的那种，呃，没有性别觉悟所给我带来的那种痛苦和困惑，是非常负面的，对一个女人的成长是很不利的。那么，我就觉得为什么女人要受到这样的，像我这样的女人要受到这么负面的这种社会暗示和心理暗示呢？我觉得这是不是对女人的不公平，那么，实际上，我想，跟我有同样素质和我外貌水平一样的男性，他的感受一定跟我不一样，当时就有，有很多女孩儿，就是当时呀，就是男人对我，对我，没有问津，没有任何男人向我，对我问津的时候，但是很多女孩儿会说，如果你要是个，呃，你要是个男的，我一定来追求你。因为我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而且我，我非常的热情，而且我也是很有那个凝聚力的一个人，所以我周围有很多女孩儿都非常喜欢我，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女的，没有男的。所以我就想那如果，那，这些女孩儿对我的那个，呃，给我的评价，就让我想到那如果我要是个男的，我就一定很受欢迎。那么，为什么同样是我，只是因为性别的原因，为什么就让我...就是说在别

人...就是社会对我的认可或者两性关系的认可当中，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呢。是什么造成了这个东西？我就开始思考，但是没有答案，没有结论，就这样胡里胡涂就毕业了。（笑）

张：直到九六年，您...

葛：呃，不，我就八八年，我就毕业了。

张：直到九六年，一个朋友的一句话？

葛：不。八八年我毕业，我就到了福特基金会去工作。哎，在福特基金会呢，我就接触到了发展工作。然后，发展工作里面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这个发展的进程嘛。所以我就接触到了社会性别，哎，这个工作方法和这个概念。然后呢，我又接触到了女权主义。那么，我为什么说我的那个朋友或我的那个同事，她给我那么大的影响呢。就是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仅和她，就在福特基金会，她是我的同事，她是我的老板，就是这个“白梅”，哎，那么，我呢，我那做她的助手，我们共同做那个妇女生殖健康，这样的项目，我做她的助手。那么，这个呢，让我有机会开始接触女权主义理论，那么，我要想了解社会性别，了解社会性别的那个发展的工作方式，那我首先了解这个，这个后面的理论背景是什么。那么，这就是妇女，呃，就是女权主义理论。那么，我就开始读书，然后读着读着读着我才觉得，哎呀，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张：读的是什么方面的书，英文的，中文的？

葛：中文，中文的，中文的，哎。基本上都是翻译的。

张：翻译的？

葛：哎，翻译的。然后呢，就是，我又交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都是西方的女朋友，包括就是我的这个老板，包括 Lisa 就是后来又回到福特基金会来工作的这个 Lisa，包括 Sussie。然后我们就不断，不断的来讨论这个，我们的这些感受和困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怎么



来解释？后来我就发现只有女权主义这种解释让我感到是最让我幸福的，而且是最能够到，解释到，到位的。让我心服口服，而且让我就是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做为一个女人我就再生了，我就能够克服掉，就是我青春期给我带来的这种压抑呀，这种否定啊，就是这种负面的东西，我才从阴影当中走出来，就是人生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张：那您走出之后，您又进一步怎样地发展呢？您个人和您个人周围的一些工作上的这些组织活动啊，这种理念的实践？

葛：对，我想，这个就是，我参与这个，呃，妇女运动方面的工作呢，首先是和我，跟我的职业不分...就是因为我有幸到了福特基金会这样的一个单位来工作。那么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一个是促进当地的妇女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第二个促进妇女理，理论研究和妇女，呃，实践活动的开展，在当地。那么我自己就要...既然要做这个工作吧，我就要学习。那么我同时呢，也接触到了一些，就是妇女活动的积极分子以及呢，一些女权主义学者。那么，我和她们的接触呢，都是我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我自己呢，也组织了一个小组。哎，就是在一九，一九，九二年的时候，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东西方小组。其实这个东西方小组的发起人呢，是我和那个 Lisa。当年呢，她在福特基金会找到了一个顾问的工作，就是呃，代表福特基金会协助中国的非政府妇女筹办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那么，Lisa 作为一个非常了解国际妇女运的这样一个积极分子，她也是一个学者，她当时接下来这个工作以后，她就知道，就是中国的妇女，呃，积极分子以及中国的妇女理论和当时的那个西方的这个理论在概念方面，在...呃，工作方法方面都有巨大的差距，而且就是对于，比如妇女面临的最大的，呃，比如说，呃，最急迫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中国妇女的理解和西方妇女的理解都不一样，她就觉得这里面存在的很大的差距。那么怎么办？就是说到了九五年，世界妇女大会开的时候，中国妇女必然要面，面对国际妇女运动。那，呃，如果我们就带着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去参与的话，我们会有，很可能产生冲突或者产生误解，或者产生，呃，失落感吧。那么我们就想到那我

们能做什么，作为，当时，我们作为一个，一群年轻的，呃，女性，在北京，职业妇女，我们能做什么。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翻译小组，能够，呃，在世界妇女大会前两三年，就把一些西方的女权主义的，呃，理论、文章翻译到中国来。那么，让中国妇女能够了解，就是西方的女权主义，她们都在关注什么、探讨什么，都有什么样的概念，呃，理论概念，还有那个分析框架，等等吧。所以呢，我们就组成了一个叫东西方，呃，翻译小组。那么，这个小组呢，就由中国和国...，呃，外国女性组成的，我们都是双语。呃，那么，我们每一次的那个，就是两三个星期，我们就会聚一次，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呢，是做翻译，但是翻译之后，我们还会讨论。因为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的翻译，其实是一种文化的翻译，是一种概念的翻译。我们在这个翻译过程当中就有，发现有很多的概念是中国的话语里面所没有的，那么，我们就要怎么，怎么，怎么把它最恰当地翻译成中国妇女能够懂的这些词汇，或者说我们怎么创造新的词汇。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讨论，那么这个讨论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自我成的过程，也是我们向西方的妇女来了解这些概念背后的社会发展这个，社会发展，呃，路径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像我们遇到了“gender”这样一个词儿，哎，我们觉得，觉得很难翻译的时候，我们必定要有人来给我们解释，这个“gender”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人要来给我们介绍，我们应该看哪方面的书，我们才能够最粗显的了解，就是“gender”的，它的内涵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这个，呃，翻译，就是说从表面来看，我们仅仅是一个翻译的工作，实际上是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自我反思和自我认识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我们，呃，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随着这些理论和概念不断的被介绍进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豁然开朗。就是发现，啊，原来这些东西能够那么生动的...比如说像性别角色、性别角色，定位，呃，就是性别关系，性别的权利关系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原来就像，呃，就是一个，一个特别灵验的钥匙打开了，我们以前，就是特别困惑的，我们的那个心灵的锁，枷锁，就，就一把一把的启开了。就让我真正的看到了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个位置，以及我和男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

关系，那么呃，我应该来如何重新来鉴定这种关系使我自己不失去我的一个中心位置和自身的那种价值本位，就这种意识才慢慢被提升起来。哎，所以我觉得这，这也是我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呃，有多少人参加，我们这个小组从八八年一直活动到一九...，呃，不，呃，从八八年一直，呃，不，sorry，从九二年一直活动到一九九九年。呃，一直活动到二零零零年。所以，我们有八年时间，我们的人不断在变，但是我们平时一般保持在二三十个人，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人。然后，反正大家都是互相朋友介绍啊，那个，呃，我们也自己到外面去找一些跟我们有志同道合的这种观念的女孩儿呀，我们把她们都拉进来，呃，然后就坚持了七八年。那么，就是时间活动的长的这些，呃，成员吧，今天看来已经成了各个妇女组织也好，和各个有关单位的一些领导人了，或者他们的，就是学术骨干。比如说像“冯媛”、“卜卫”、“刘伯红”、“张李玺”全是我们当年的成员。今天他们已经...或者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或者各个组织的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当然我不是说只是因为我们的“东西方小组”，仅仅是因为“东西方小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认为就是我们当时的一种，呃，创造的一种学习环境，以及这种交流的这种氛围，以及呢，就是...(停顿)以及就这个过程的确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都非常有益。

张：你们小组翻译了多少女权主义的西方的书籍？

葛：呃，有...我们不是翻译的书籍，我们是翻译的文章，都是一些，呃，就是不是理论性非常强，那...就是非常女权主义的一些文章，大概翻译了有几十篇吧。然后都登在中国的妇女杂志上面，各种各样的妇女杂志上面。

张：您在这个小组当中起什么作用？是什么样的角色？

葛：我一直是这个小组的招集人，嗯，就是说，一开始是和 Lisa 我们两个人策划的这个小组，因为有七八年的过程嘛，所以这个小组的人来来走走，来来走走。但是我是唯一的一个是从头到尾参加的，而且在...，呃，这个七八年当中至少有七年或者六年，我是一个招集人。呃，那么我的这个招集呢，也包括就是策划我们每一次谈话的话题是什么，我们选哪个方面的文章

来翻译。呃，其实我们的那个翻译吧，不仅是有英文翻成中文，我们也有一些是中文翻成英文的。后来呢，就是这个“东西方小组”也为其它的一些发展项目提供了一个翻译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帮那个就是陈明霞她们在迁西搞了一个妇女法教育的一个项目，给农村的妇女普及妇女法教育。她们就编了一个七本的，就是妇女法宣传的小册子，每一个册子，呃，都是用漫画和很简单的文字来阐明妇女法当中，比如说妇女权益保障法当中妇女的某一个重要的权利。那么这样有一个系列，像她们这样的一个小册子，我们就...，也是我们的小组就把它们都翻成了英文。她们出的中文，我们翻成了英文。然后呢，呃，那个，世妇会之后，福特又做了个项目，就是女性的反响，出了一本书，叫《女性的反响》。就是请大概一百多位参与过非政府组织筹备活动的这些妇女个人，写一些就是参与世妇会筹备和世妇会本身对她们个人的那个人生，呃，个人的影响，这样一本书。这本书也是由我们翻成...从中文翻成英文的，就是由我们“东西方小组”，当然还有一个“中加女青年”。当时另外还有一个小组，叫“中加女青年”小组，由我们这两个小组共同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所以我们翻译当中有书、有文章，呃，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小册子。我们那个早期翻译的这个文章当中，我们的那个主题呢，牵扯到...，呃，牵涉到，比如说“家庭暴力”。这个对中国那个妇女来讲，都是很新的一些概念，呃，我想啊，有暴力问题，呃，还有，比如“妇女的性权力”，呃，还有...呃，媒体...；“妇女的形象和妇女的关系”、“媒体和妇女的关系”、“妇女和环境的关系”等等吧。就是这样的一些主题的文章。

张：那您谈到“家庭暴力”，在您的活动当中曾经有过关于“家庭暴力”的哪些项目？

葛：对，对。那是一九九三年，啊，不对，一九九八年。一九九八年呢，我和陈明霞，还有，呃，陈一芸，我们三个人有机会到印度参加了一个那个家庭暴力的研讨会。然后这个研讨会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就是家庭暴力对于中国妇女意味着什么？呃，而且中国妇女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其实都不是很了解，只是觉得好像这个“暴力”，呃，现象是存在的，

那么对中国妇女的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呃，就很...发现这样的...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少，研究资料非常少，数据也非常少。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在现有的那个机制当中，中国现有的机制当中有多少能够对“暴力”，“家庭暴力”做出反应的，以帮助妇女，减少家庭暴力侵害的，这样的设置。我们也觉得一个是不太清楚；第二个，它有没有，存在不存在，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呃，那中国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个“暴力”的项目，所以呢，我们就在一起不断的策划，这个策划过程也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并不是我们三个人回来以后，觉得...呀，对“暴力”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呃，我们三个人坐在那儿，就想一想，我们该做什么，就，就，就做了，不是这样的一个操作过程，呃，实际上是我们把当时在北京的二三十个组...，妇女组织的相关人员全都请到一起，用一种就是“头脑风暴法”的工作方式，让大家来谈，就是说，你对“暴力”是怎么看的。第二个，你觉得如果中国要做一些关于针对家庭暴力的活动，你们觉得应该做什么。我们就在一个大黑板上，就把大家说的列下来，一条一条的列下来，列下来以后大家再排序分项。然后我们就排了大概有七八项，大家认为是最急迫的，要做的。我现在还记得，就是说，比如有的人就提出我们要能够描述中国家庭暴力的一个现状，我们需要数据、需要研究。那么，好，我说好，那我们就研究、调查数据。那么，就有的人就说，呃，我们需要提高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为现在社会，这个还是一个沉默的文化，都不被大家所关注，好像我们都认为这个问题好像不存在，又觉得它存在，觉得应该提高公众对“暴力”的认识，那么就是说要跟媒体合作。好，我们就要动员媒体，宣传家庭暴力。哎，那么又列出一个活动，那有的人就说：‘我们要干预，那么有的妇女受到了那个“暴力”侵害了，她到哪里去求援，那我们就会想现有的居委会，现有的那个派出所，他们对“暴力”是怎么认识的，对“暴力”有没有这个...一个反暴力的或者遏制这种暴力的一种机制的存在。我们说不知道，我们要去...去...先去了解他们的工作程序；第二，看看有没有现有的制度下面挖掘出的这样的资源，工作资源；第三，我们还要培训他们，让他们认识到“暴力”不光是家

庭纠纷。你作为一个警察，或者作为一个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呃，有义务来制止“暴力”。那么，我们要说，噢，那就动员，动员警察，呃，那个，提高警察的敏感性，我们要对警察进行培训。那么另外，就是说法官，律师，在他们办案的时候。所以就这样一项一项地列。

葛：那女人受到的压抑，是吧？如果我要是一个有社会抱负的一个女性，那她在职业方面，她在那个受教育，呃，这个机会方面，她在参政的这个机会方面跟男的完会都不平等，所以，可以...她可以很漂亮，但是她依然有受到男人侵犯和压抑的时候和地方。除非她就没有这种觉悟意识，那是另外再说了。再说了，我告诉你，西方的女权主义人家把那个男女关系已经分析到哪个层面了，男人的那种注视就是一种剥夺和侵犯，她如果是漂亮的话，她应该更受到更多的这种侵犯。当然，男人的冷落和排斥是一种侵犯，其实男人的那种注视也是一种侵犯，是不是？

张：对。

葛：她受到的注视更多嘛。

张：观看的眼光，观看的方式...

葛：哎，凝视。凝视本身就是权利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他作为一个欣赏的主体来观看你的这个客体，那我想漂亮的女人是被侵犯最多的了。另外，漂亮女人，她遭受的性侵犯也是最多的。上...我们上了车，可能男人不屑得摸我们，是吧？有多少男人会那个...(笑)可是对漂亮的女孩，那个很...很不尊重的摸她的...有意无意的摸她一把，或者蹭她一下，她受到的这种几率更高啊，她难道没有觉得自己被侵犯了吗？她是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个体呢？谁有权力在没有她同意的情况下，认可的情况下，可以随意的摸她呀？所以，漂亮女人有漂亮女人的受压迫的方式；有钱女人也有有钱女人受到压迫的方式；有权女人有权女人受到压迫的方式。吴仪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如果吴仪是男的话，那爱情不是属于她的吗？为什么她是一个女人，爱

情就与她无缘呢？实际上就是权力、财富和女人获得幸福的几率是成反比的嘛，而和男人是成正比的。这是不是对女人不公平啊？（沉默）

张：很好的…。

葛：所以，我觉得性别压迫是有共性的，它绝不是个性的。这才有了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基础。如果只是个别妇女的经验，甚至是某个阶层妇女的经验，我觉得女权主义不能形成一个国际浪潮。但是女权主义二百年来，它成为一个跨时代、跨国界、跨文化、跨民族的这样一个国际运动，是因为妇女跨文化、跨阶级、跨种族、呃，跨国家的，跨民族的，都受到了性别的压抑和性别的压迫。这种压迫是妇女的共同经验，这也是妇女运动，是一个国际女性潮流的一个根本原因。所以，我觉得在妇女运动当中，我们要讲到的是团结，是…强调的是形成合力。当然，就是说，妇女身份是多重性的，那么，我们的多重身份会使我们在有些运动当中持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但是我相信呢，就是，作为一个性别，我们是有一个共同利益的，这就是性别利益。基于这种性别利益，我觉得就是全世界的妇女运动有基础，就是有理由团结起来去抗拒一个现有的性别秩序和性别结构。

张：那这种性别意识在您的工作有没有渗透或者是反应出来呢？呈现出来呢？

葛：呃，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回顾我自己的事业经历呀，我觉得我在福特基金会的五年，我基本上处于学习阶段，学习和积累、了解。再加上“东西方小组”的这个业余的那个学习，实际上它是和我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离开福特基金会以后，就去了联合国开发署，那么联合国开发署当时…实际上就是为我创造了一个…职位，是和妇女运动也是相关的。呃，我到了联合国开发署就有两个职能，一个职能呢，就是协助联合国机构筹备妇女大会。我是一九九四年的…（回忆）我觉得我是一九九四年的六月份进的联合国…，呃，联合国开发署。那会儿呢，可能离那个妇女大会还有十五个月的时间，那么，联合国机构呢，它也要协助中国政

府，协助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妇女...呃，那个来准备这个妇女大会。所以呢，他们需要建这么一个位置，增加一个职位。另外呢，就是当时的那个联合国机构还有这么一个...也是一个机制吧，一个机制的保障，就是，所有的这个机构里面要有一个性别问题联络人，我们叫“gender focal point”。那么，呃，我...我去了以后呢，我也...就是妇女的性别问题联络人的这样一个职能。那么，呃，实际上就是说，我当时进联合国就两个职能，一个就是协助...呃，那个中国政府和中国组织把非政府...呃，把那个世妇会，呃，筹备好。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联合国开发署援助中国的项目当中确保性别公平，这样一个精神。那么，就是“gender focal point”这个人要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一进去，就是这两个职位。

那么，我为什么能够获得这个位子和我就是在“福特基金会”五年的积累和我在“东西方小组”学习炼就的那种性别意识就非常的...呃，关系非常密切吧。呃，然后我为什么就是叫我自己“性别警察”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在我那个机构里面，就是负责，确保我们对中国的那个援助具有性别平等的这种...呃，这种观念和这种保障在这里面。那么，我呢，用什么方式来保证我这个职能，就是说，来完成我这个职能呢？那么，我们当时在联合国的时候呢，有一个叫“项目审批委员会”。就是我们每给中国政府援助一笔...就是每...每...每给中国政府一个援助项目之前，呃，联合国开发署的代表和政府的代表，受援单位，三方要开一个评估。那么，这个就是评估这个项目，它的经济效益呀，社会效益呀，等等。那么，我呢，把这样的会就变成了一个我施加...施加影响的一个机会，所以，这种会我每次必到，那么我会很仔细的看这个项目文本。那么，我要再看，就是说而且我要分析，就是这样的一个项目谁是受益者。呃，那个在受益者当中男女...是男人受益还是女人受益，那么，有没有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种机制的保证，能够保证妇女和男性平等受益。后来，我就发现，呃，我们的项目，大部分项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我的介入的话，我们大部分的项目的受益人自然而然都是男性。因为，我们的那个合作对象吧，往往是政府的官员，政府的部门，这些部门...而且我们的那个项目活动啊，



有很多是国外去考察、研讨会，然后到国外去...呃，就是一些短期的进修，甚至还有一些去读学位呀，去学某些理论啊，技术啊，什么的。然后，你想，这种机会，本身那个政府的那个机构，他们就是到了一定级别以后，男女就...比例就失调了嘛，那么，如果你在这里面没有一个硬性的指标保障的话那么，到最后受益者无非就是男的，那么，我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说，联合国像这样的发展机构，他们就是如果我们忽视了就是性别的这种公平的话，他们可能在性...就是说因为这种援助反而加大了中国的两性差异，它并...它不仅没有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它还使中国的社会...就是发展相对的落后了。因为你的这个援助你不能保证男女都能够公平地受益，甚至是女的应该受益更多的情况下，因为本身女性就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那么，如果你的资源更多的给了，这个强势的性别的话，那实际上你在最后的客观上加大了这种差距。而联合国的宗旨是公平，这个很...很平等，这种公平包括了就是阶级、等级的公平，包括性别的公平。所以我就在联合国的那个这些会上，我就在不断的来强调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不注重性别公平的话，联合国在中国的援助是加大了中国的社会差异和性别差异，而不是在弥补这个差异，促进这个国家公平、平等的发展。所以呢，我就每一次，就就算，算这些数字，算这些资金的分配，然后我就坚决的要求他们，当然我这个做法也比较机械，就是说那你写上，你这一次的受益...受益人比如说是一百个的话，你写上妇女不得少于百分之四十，或者妇女不得少于百分之三十。就根据这个项目的受援单位，他们的那个...就是组成结构来做一个...当然只能是一个现实的...当然最轻的是妇女不能少于百分之五十，但是这个在中国来讲是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实现不了。因为女的就没有百分之五十，他再选拔，因为都是一些专业性的培训嘛，或者专业性的一些机会。那个也不现实，那我就说不得少于百分之三十，那可能这个单位的在那个层面的女的只有百分之二十那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说明你没有资格得到这个援助。所以说这是一个做法。

还有一个做法呢，就是我会...因为我们那个联合国的项目吧，它一般是要有一个立项的过

程。这个立项的过程呢，是会请一些国际专家来论证和那个跟共同合作的中国的那个有关部门共同合作来立项，然后提出你的项目报告。那么我就会争取在这样的专家团里面加上一个性别专家，也只有我会非常有意识的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我...我会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让他们能够接受这个评估团里面应该有一个...一个性别专家，做为评估专家。因为她可以在带进一个性别分析的视角。对于，就是说只有你来了解...就是在你分析这个社会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性别的眼光，你建议的那些对策才会有一个性别的...呃，就是说才会有一个性别的角度吧，视角吧，然后，才能够往性别公平这个目标上推进。很难，不是说我每次都成功，但是呢，就是至少我要发出声音。所以，我就后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这不成了警察了吗？一个一个的我要审，一个一个的我要看。然后，以后就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只要一说话，他们就是说 women。(笑)他们就知道了，她又要谈女人的事情了。(笑)然后，那个但是我就...我不管，你既然赋予了我这样的一个使命，而且联合国机构既然设置了这样一个位子，我就要让这个位子发挥作用。

张：那你觉得这个执法的力度很...很强，执法的效果呢？

葛：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因为这个现状是很...很令人...就不令人满意的嘛，那么...哎呀.....我觉得不是很好，不是很好。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办不到。比如说你的一个研讨班，一个研讨会，你真的是让它有百分之三十的妇女，保证了百分之三十的妇女，它就没有，你怎么办？而培养一个妇女可能是需要十年二十年，她才能达到一个决策的这样一个水平，或者一个专业很高的一个水平。所以有的时候你也急不来，而且我也觉得我们那个真是无奈之中的一种心理安慰，有的时候就觉得。因为我为什么会强调这个数字呢？就是说就是因为为了今后的评估。你写到文本上了，那么你有没有完成你这个项目的任务。到最后人家评估的时候是拿这个东西作为依据。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不能保证就是这个指标一定能实现，但是有这么一个指标。对于就是哪怕是最后这个项目的评估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至少评估会说中国的这个项目在这一方面不令人满意。有那么一句话，也会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也觉得不

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数字改变现状，这是不可能的。你只能起到，就是起到两个目的：一个是提高大家的意识，就如果你在会上不嚷嚷这一句话的话，大家就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你想主席台上坐着百分之九十的男性，我们认为非常正常；一个考察团到国外去学习一项先进的技术和学习一个先进的，那个，决策，百分之九十五是男性，我们没有觉得是个问题，在常规人的眼里。所以你必...就是你只能提出来才会让大家知道：噢，原来是个问题。这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说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可能评估的时候再一次加深别人的...我至少有一个保障，而且我评估的时候就用这个数字来评估，那么，再一次警醒别人这是一个问题。能做到的仅仅是这一点。所以男女平等...怎么讲呢？

张：任重道远。

葛：任重道远，男女平等任重道远。

张：那么，除了这个方面的工作呢，您在其他领域这个社会性别的渗透还有哪些？

葛：噢，那么，还是跟我的工作相关啊，另外一个就是我比较值得那个骄傲的就是...也是我在联合国做项目官员和时候。我呢，就抓住了一次机会，有一个三万美金的一笔资金。这一笔资金呢，谁都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总部来...我们的总部有无数的文件过来。然后呢，就是经常会这儿有一笔二十万的钱呀，那儿有一笔五十万的钱呀，都是用于不同的这个项目的。那么有一次，突然我从我的总部来了一.....但就是说联合国开发署有一个，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的每一笔资金的花费都需要和中国政府来协商，必需由中国政府同意和批准，我们才能够...呃，最后联合国才能够最后批准这笔资金的使用方向。但是呢，只有这笔钱呢，是一个...建立性别能力，哎，建立...就是说联合国机构甚至包括联合国机构在中国的政府合作单位的性别能力，就是性别平等能力，的一笔很小的钱，就三万美金。然后呢，大家谁都没注意。当然因为我作为一个性别...那个联络人嘛，我当然就注意到这笔钱。就这笔钱是联合国可

以自己来做决定。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必须抓住，因为其它的钱你都得和中国政府去协商，而中国政府呢，往往会认为妇女的项目或者性别的项目并不重要，中国要扶贫；要解决饮水问题；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就业问题，那那那那些问题严重了，性别平等从来不在他们的...就是很少拿在他们的议程上。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资金呢，也大部分都用在了这些所谓的更急迫的这个项目上面。那么，只有这笔钱呢，是我们联合国自己决定的三万美金，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呃，然后，我就...我当时觉得这么小的一笔钱应该把它用在刀刃上。那么我就觉得呢，就是开发性别培训，社会性别分析，培训教材以及培养中国的这种培训能力是很值得的。然后呢，我就马上就写一项目建议书，然后，我就把这个项目就呈报到我们代表那儿。我们的代表呢，日理万机，(笑)那个非常的繁忙，所以呢，他那个...眼睛都盯在三百万、五百万、二十...就是一百万、八十万这种大项目上面，他就根本就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笔钱的存在。第二呢，他也根本没时间来查看我的项目建议书。然后我就在他那个有一天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去了，我就把我这个项目建议书就给他了。他连看都没看，说‘可以，你做去吧。’然后就批了，一签字。

然后，我就开始策划。从找专家，然后找那个教材，我把很多的各个发展机构已经编好的一些英文的...就是社会性别与发展，这样的培训教材找过来。然后我找，我自己选择了一些我认为很有这种女权意识，又很有平等和发展意识的这些女性过来一起工作。我们形成了一个小团队，包括王佐芳一起...我们就说翻译和写作，决定这个教材的内容，然后呢，商量培训方法。一起工作了大概六七个月，就把这本小册子...就是小册子编出来了。据我所知呢，这是中国第一本...就是中文的社会性别培训手册。那么，因为我觉得呢，就说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个“性别培训”这个手册呢，是因为我希望...我们...比如说联合国这样的一个发展项目，你要真正达到性别公平这样一个目的话，你首先要提高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和管理者，他的性别觉悟，让他把它变成自觉的一种追求，而不是仅仅在那个纸面上写着的百分之三十妇女参与率。因为，

如果他不懂得有这个必要的话，他也不会主动的来想办法来达到这个百分之三十。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展项目当中在早期他们介入项目的时候就对他们做这种社会性别敏感的培训，让他们知道这是一种不公平的这种...呃，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可以从更公平的社会关系当中受益，他们就会变成一种积极...积极主动的一种行动，那么这是...就是当时我们想到的一个培训对象人群。

第二个对象人群呢，我们就觉得是决策者、官员，如果他们有了更高的，更好的性别敏感程度和性别意识的话，那么在他们做...做重大的决策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考虑到性别公平这样一个...一个因素。比如说，中国的那个退休年龄，男的是六十...六十岁，女的是五十五岁，这个就是...完全公然的就是性别不公平嘛，那么肯定是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性别平等的意识的人来做的这个决策嘛。那么，所以我就...那就是如果这个决策者如果能够加强他们的那个性别平等这个认识，那么，今后可能我们会避免更多的这种决策，这种公然的不平等的这种决策。所以呢，就是说，政府官员也是我们当时想到的一个目标人群。那么这个...这套教材呢，编出来了，而且就是我们还把编这套教材的人当作了我们早期的一个性别培训的...培训师资源。那么到了今天可能已经有...也是四五年过去了吧。这一个活动在中国就...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那么我...我也认为呢，就是说，这也是我利用了我在联合国的这个位子，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一种考虑。

这个三万你可以去干别的，你也可以干这个。那么我觉得如果要达到一个可持续的影响力的话，我认为就是性别平等的培训和性别平等的这个分析工具的传播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儿。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我自己还...也蛮骄傲的（笑）那么这样...这样的性别培训的那个工作现在还在持续当中，那么，需求也越来越大。呃，后来，而且呢，就是说联合国开发的这个工具，培训工具也成了其它的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培训资源了。比如说后来我们做那个“暴力”项目的时候，我也是这个项目的...等于说发起人和早期的一个推动者吧，在我们立这个“暴力”项目的

时候，我也就把我的观点亮出来：所有参加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就分项目，十几个分项目，项目的...分项目的骨干和管理者要参加社会性别培训。而我们的“暴力”，“家暴”项目的一个理论基础也是社会性别分析，作为我们的分析工具，最基础的分析工具和视角。那么大家也都认同，所以后来这些培训资源被暴力项目用的非常充分。像冯媛他们忙的不亦乐乎，然后后来陕西的又请他们去了，东北的也请他们去了。反正别人，就是说怎么看待你这一个培训资源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也是现在全国各地的去做培训，至少在我们的“家暴”上面，“家暴”项目上面，我们是当做一个基本原则来做的。就是所有的人没有经过...就是性别培训，不开展工作，就不开始工作。所以，而且我们的培训还分一次、两次、三次，呃，递进式的一个过程。然后他们做培训的时候又把家庭暴力和性别分析又融在一起，开发了新的培训...模式、模具，也很有意义、价值，我觉得。

张：您刚才讲到的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您刚才说大家把这个立项，家庭暴力的几个方面列出来以后，接下来呢？如何...

葛：接下来，对，接下来以后呢，我们就让大家认领了。你看，你觉得你想做哪一个？哪一个最吸引你？所有的这些组织大家在一块儿，然后你就说你想做哪个？那么，后来就是，呃，“首都女记者传媒监测小组”，她们就认了传媒这一块儿。因为她们觉得提高媒体工作者的家庭暴力意识以及影响主流媒体的这个对“家暴”的这个报导是她们的强项，她们就这块领走了。然后呢，比如说对“家暴”的受害者提供一百个案例，那么就被“红枫妇女热线”她们领走了。她们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有强项，我们来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家暴”的调查，基础调查，基础数据以及总结出、描述出中国家庭暴力现状，这样一个项目呢，就被中华女子学院...她们说我们可以做，我们领走。所以，整个这个决策是一个民主的决策，是一个大家参与的一个过程。这个我觉得也是“家暴”项目比较让我感到自豪和欣慰的，那么我们...然后呢，就是

说，你领走了，行！你去写项目建议书，你准备怎么做？你觉得你可能要多少钱？你给我们提出一个建议。所以大家就把任务就分下去了，分下去以后，我们再会。定好一个日子，然后，每一个...就是分项目找一个联络人，你自己去...组织人。然后呢，我们定好，比如一个月以后，你们拿着你们的就两三页的一个初步的一个设想和你们需要的一个预算，再过来，我们再开会。那时候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是那些领头的，又到我的办公室，我把大家都聚到...招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再来开会。然后，我把所有的这些分项目的这个建议书又凑到一起，这就...然后就去...去找钱。这就是成了我们后来向那四个国家提出项目申请的一个依据，然后我们把它再编制成一个总项目去申请钱。那么，呃，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呃，就是大家也...我个人我认为也是有意识的向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女权主义最根本的价值...就是它的那个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挑战现有的文化秩序，挑战现有的组织和管理架构，要有我们有别于传统做事方式的一种新的做事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挑战男...男权文化呀，就是因为男权文化不公平嘛。它是一个等级文化，它是一个排斥性的文化嘛，它是一个压制性的一种文化嘛。它压制了某一个性别嘛，所以我们女权主义其实根本利益在于要颠覆原来的那种文化架构，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架构。那么我就觉得在我们的运动当中，在我们的组织行为当中我们应该有意识的追求一种和传统的领导方式、管理方式、组织方式不同的另外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当时觉得呢，这种方式是什么呢？是参与、是平等、是分享，而不是排斥、等级和控制。所以我觉得家庭暴力项目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在于它第一次正视家庭暴力这样的一个事实，然后为中国反家庭暴力的理论和行动探索，做出探索这个价值。第二个价值，它在整个的立项，形成项目以及项目执行和组织过程当中，它...呃，尝试一种新的和传统的男权的这个模式所不同的一种新的模式。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我们是在培育一种新的文化，而女权主义我认为最高的一种境界是要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从原来的，和原来的传统文化绝裂，创造一种新的文化。

张：这种新的文化在您的眼里看是有一种标准的吗？还是有一个样板在那里？

葛：呃，没...我我...对这一点我认识不是很深刻，我自己在这方面...呃，那个理论呀，学习呀都有限。但是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女权主义所追求的一种新文化就是要反传统的，我们所有的给我们带来不满和压抑的这样的东西，比如等级制，比如说排斥、比如说控制。那么我觉得至少我理解的一个新的文化建构是...应该是一种参与的、一种平等的、一种和协的，一种...呃，一种公平的，让你...就是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尽情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新文化。它不是以...就是控制别人、压制别人、限制别人、限制某一群人。就是一个...如果一个社会也是，我觉得男权文化和传统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某...就是统治者，他为了稳固他自己的统治，他是以压制、排斥或者是控制其他一些社会群体来实现的。这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文化。那么妇女就是在这个当中恰恰就是被这些东西所...所害，而且就是...我们就是...就是...就是受到了这些压迫、控制、剥削和，怎么说呢，排斥。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要反的东西呢？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所以我个人理解的一个...一个新的文化，一个和原来既有的这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它是能够让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都能得到充分发展、充分自由的一种新文化。那当然我们不可能改天换地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至少我从我现在能够做的这个小的项目和我们能够...呃，这个控制...呃，不是不是控制，和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这个过程开始嘛。我觉得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让我感觉到为什么我强烈的想追求这个东西呢，也是因为我也注意到了就是很多的女权主义的组织，实际上它们在追求男女平等的社会理念的时候，它们忽视了一种文化建设和这种追求，它们可能是在扶助妇女，呃，那个...支持妇女，这样的项目。但是它们自己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文化，领导文化是完全是从男权那儿借用过来的，丝毫没有改变。有的甚至比男权的这个结构更压抑人，更排斥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种妇女运动的这个实践是...应该是个全方位的，是一个...一个...一个...一种彻底的、深刻的一种运动。



我觉得其实我...我的贡献吧，真的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战略性贡献，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的长处，我觉得我是一个...还是一个有眼光的人。所以呢，就是说我会它的初期，在它的设计里面会加上某些原则性的东西，而且我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呢是比较有说能力。我能够把我的这些想法通过我跟别人的交流，让别人认可，也成为别人一个追求的目标。后来陈明霞我觉得真的就是按着这种目标来进行的，所以我觉所有的事全是她们做的。

张：您看一下我们大陆现在的女权主义的发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用您的眼光来看。

葛：我觉得呢，还非常的薄弱，非常的脆弱，而且是在就是说力量非常的弱小，呃，很多还是处在萌芽阶段。

张：“脆弱”怎么理解？

葛：“脆弱”就是说它连合法的生存空间都没有啊。呃，只不过就是现在主流社会对你睁一眼闭一眼而已，你根本就没有到让人家要正视你，把你当作一种威胁的程度呢。如果一旦主流文化觉得受到了一种威胁，他们要遏制你是很容易的。这就是我觉得的“脆弱”。大家都在夹缝中生存呢。这种脆弱有制度上的脆弱、资金上的脆弱、生存空间上的脆弱、政治合法...就是合法性的脆弱，都非常非常脆弱。而且现在还能生存，恰恰说明你...你很弱小啊。主流文化都没有觉得你是一个威胁，如果它要觉得你是威胁了，它要来清除你是易如反掌的。我觉得这些我们这些组织实际上是没有还手之力的。所以是脆弱的，另外它也弱小。但是它有很强的先进性，它有很强的生命力，我觉得。从长远来讲，因为它毕竟代表了一种...(思考)更有活力的一种...一种精神和价值，而且是中国社会的前进所必不可少的。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女权主义的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妇女运动的最大价值嘛，它是追求平等、追求公平。我觉得这对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两个理念是绝不可少的。这个其实又回到了那个刚才就是对那个中国文化的又一个看法。就是如果...就是中国社会从五千年的这个历史走...走到今天，它到今天依然不能说它是一

个公平、平等的社会，而且追求自由、平等、和公平没有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共识，不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共识，也不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我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在不公平、不民主、不公开、不开放、不包容的一个环境下，它怎么能发展？有多少人的这种创造力、个性和热情，在社会中被压抑掉和消耗掉。所以一个...我觉得一个不平等、不不不自由、不公平的一个社会发展本身，就是它受到了它自己的内耗的；首先最大的敌人是它自己的内耗，就是这种制度产生了这种内耗，对人的这种压抑和浪费。对人才的一种浪费。

所以，我觉得就是女权主义它追求的这个理念是非常先进的，是中国社会非常需要的。所以它的先进性不能质疑，不可质疑。这个先进性给了它一个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可能今天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它是符合这个社会进程的需要，尤其是中国社会。所以我觉女权主义在中国非常有价值，就这些妇女组织在中国的生存对于我们...就是说社会文化的重建来讲，都是极有价值的。但是你说中国的这些妇女运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其实它这个现状又是初步的，就是很初期的一个现状。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实际上现在的一些妇女组织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又是一个服务工作，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服务性的，仅仅是作为受害，被边缘化这种脆弱妇女群体的一个支撑而已。很多的妇女组织还没有自觉的把追求公平、公正、民主这样的理念当做它的一个自觉的追求，没有。所以现在它只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所以它的政治性不高。

但是我自己认为女权主义就是政治的，如果我们不能把它提高到政治层面，不能提高文化层面，来为...就是说我们自己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的话，我们会注定地脆弱，我们注定地弱小，我们注定地不堪一击。而且有没有前途，不知道。就很难讲了。因为服务的供给者，你不提供，别人可以提供。如果你没有一个强烈的社会理念和政治理念作为你的支撑的话，和作为你的眼光的话，你仅仅作一个服务的供给商，就是供应者。那么你不供给别人，也没...也有供给，所以你的价值并不大，不过你服务的对象是女人而已。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妇女运动要有眼光、要有远见，另外还需要出色的领导人。另外我觉得

中国妇女运动就是我们的这些行动者...应该有一种合作的意识和一种使命感，这个使命真的是不仅仅就是说我为一两个脆弱人群提供一些服务，而是说我们存在的历史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到底是什么？对这个达成一个共识，哪怕我们从服务做起，这个没有关系，而且现在也只有能做...只能做服务，这也是现实。而且我们也通过做服务来争取我们的可信度、争取我们的这个生存的...就是说...来争取我们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这个，我觉得...就是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妇女组织它实际上是把服务当做目的了。她们没有觉得这仅仅是个手段，所以我觉得呢，也是就我为什么说中国妇女运动现在还处在很早期的初级阶段，也是这个意思。

张：那您对这个展望有没有一些设想和规划，或者是实践？

葛：设想和规划，我觉得就是我在形成合力，我们要加强团结，我们要达成共识。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做到，我们现在这些妇女组织都不团结，而且互相在竞争，互相不服气，甚至还互相拆台。我们没有共识，正因为我们没有共识，我们才会互相竞争。而且我们不是一个...就是...互相...就是协作，互相分工，发挥我们各自的...比较优势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不是。就是因为之间没有共识嘛，我们不讨论这些事情嘛。

所以我觉得就需要一个领袖人物的出现。大家真的是拧成一股绳，然后，形成我们统一的一个战略。不是说这个“领袖”是一个个人，它可以是一个群体。但是要有抱负，要有这个政治眼光、有政治谋略的一群妇女。能够把大家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合力，而且还不断的发...发展壮大我们自己的力量。而且我们的手段是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和反思。我觉得这种...这种使我想到了那福特基金会那个项目。就是为什么我跟妇女学的这个关系了。就是福特基金会就让我跟加拿大的一个学者作一个评估嘛。那中国的妇女运动怎么能够深入下去，能够发展壮大，我就觉得在高校建妇女学，很有战略意义。因为它可以影响到下一代年轻的妇

女，它用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价值观念。这个当然我也想到...考虑...想到我自己大学的那种痛苦经历，那如果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能在课堂上学到这些课程，我不就是少受几年罪吗？是吧？少在那个黑暗中挣扎几年嘛。我觉得，真的，女权主义像一个天眼一样的，让我打开了一个天眼，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让我重新给自己一个定位，它给了我一个自信心。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把这样一个机会给年轻的妇女。另外我们有...就是说去在女大学生当中应该培养一批未来的同道人和未来的行动者，因为我们资金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哪一个是我们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这种...呃，就是实施干预的这个人群？我认为是高校的，我们要争夺下一代吗，争夺下一代的妇女嘛，和男权来争夺嘛。所以我当时在给福特基金会做的这个评估报告里面，我们就强烈地呼吁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因为中国当时能够开出像样的妇女学的课的学校都不多，院系都不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具有社会意义和未来意义的一个项目，福特基金会应该考虑。后来，很荣幸的是福特基金会采纳了我们的这个建议，所以才有了杜芳琴的这个项目，“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以前，福特基金会是不资助学科建设的，它可以资助一些政策性研究，但是它不资助学科建设，而且学科建设是需要资金量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就...就说...但是我和那个加拿大的那个专家都觉得，就是我们女权主义运动要发展，我们是必须要有未来的后备人才储备。当然首先最重要的是解放，就是解放妇女，它是解放妇女的一个...一个理论和工具。我真的我就希望我自己的这种受益的，这样的过程能够在千千万万的妇女身上发生。另外一个就是你只有在有了这样的觉悟的前提下，她才可能做人生选择嘛。那么我们觉得潜在中可能还会有我们的后备军呢，尽管我们今天还弱小。所以这又是我在幕后又操纵的一笔...。

葛：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妇女面对的困惑并不比我们那一代年轻的妇女少。因为她们还受到了商业文化的影响，今天女人被商品化，被商业化的程度远远高于我们二十年前。所以，如果

这种时候我们不能用女权主义的理论去和这种商业文化抗争，妇女的命运依然很悲惨。像你说的她漂亮，她以为她有资本了，实际上她的资本在实现的时候就是一个被剥夺的过程，是她主体性被剥夺的一个过程，她完全被客体化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提高女性--“漂亮女性”，“不漂亮的女性”--的这种...这种就是这种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真正在这个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活、把握自己的命运，不受任何人的操纵。包括商业文化，包括...这个统治者，不受他们的操纵。这...这是非常难...难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一个要活出境界就应该要达到这种境界，我希望就是所有的妇女都能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另外就是说女权主义理论会给这些年轻的妇女们追求这个境界的时候，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提供一个机会和一个有效的工具。

张：您说这种新的文化对传统文化，在您这种反对传统文化...在您的个人生活当中是如何实现的呢？

葛：嗯，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就是说个人生活当中很幸运。自从我离开了我的那个祖父、祖母之后，嗯，爷爷奶奶之后，我就觉得我...就是在个人家庭的生活层面就开始比较幸福了，因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人。她是一个职业妇女，而且我的家庭是一个...实际上在一个阴胜阳衰的一个家庭。我觉得我的母亲比我的父亲更有眼光，更有决策能力，更有思想，更有力量。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我上大学，报考志愿。我父亲没有想法，而我母亲就跟我说，你遵照你自己的意愿，你不要考虑父母，不要考虑家。因为很多的父母都会让孩子留在身边嘛，而我们家我哥哥已经在上海了。我父母身边就我一个孩子，我母亲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说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报考，你不要考虑父母。这样的一句话，我父亲说不出来。然后呢，我填志愿的那一个晚上，他们俩把自己关到那个屋子里，我自己决定，我父母不参与我的决策。就是说是我...但是这是我母亲的意见，就是说我们不干涉她，她自己报。后来我第一志愿，就是重

点高校，第一类没有一所是南京的，我全是报的外地。这个我觉得对于那个当时的就是中国的一个家庭，一个女孩儿在报考的时候，父母完全不给她...这个指导性意见，给她完全的自由，而且容忍她全部报在外地，我觉得是很罕见的。但是我的母亲给了我这样一个自由。我还记得送我的时候，到火车站送我的时候，我的父亲在流泪，我的母亲一脸胜利的微笑。就是说我要走了，我会去追求我的海阔天空的新的人生。我母亲脸上是欣慰的微笑和一种胜利者的微笑，而我父亲在那儿暗自落泪。

当然我父亲也是一个情感比较丰富的一个...也比较脆弱的一个男人，所以我从小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嘛，所以说实话呢，就是传统的女性的性别规范在我家庭当中没有...就是在我父母的家庭当中没有给我太多。就是我爷爷奶奶的家庭给了我很多，但是我好像就是有一种反叛精神，我根本就不往心里去，然后他们那个再逼我，我那针线做完我就忘了，我就不会再做了，不会变成我一个自觉的一个行动啊，慢慢的自己一种...那是不得已，他们...我不做，他们会打我，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做。但是到我父母的家里面，我不再有这样的控...就是被限制和压抑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自由自在成长，而且我觉得就是我的母亲是一个很有眼光的一个女人、很有胆识和魄力。就是她的那种力量绝对不亚于一个男性。所以我就我...今天...实际上我刚才看到那个题目，我才想到就是说我自己的那个...就是家庭生活，我才想到了这两个场景。我都忘...忘却了二十多年了，但是因为你今天这个问...这个问题上让我想到了其实我，在我的家里面，就不是一个传统的一种家庭模式，这可能也是我的能够接受女权主义和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一个基础吧。完了以后呢，就是我现在的个人婚姻生活呢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也是在于我有对我自己生活完全的自主性。

张：是谁先追求谁的？（笑）

葛：谁先追求谁的啊，（笑）还...还...还真是终于就出现了一个追求者（笑）。在我那个苦苦的这个...寂寞，寂寞了七八年之后，我都.....

张：耐心的...

葛：苦苦的追求，啊，不是苦苦的那个...寂寞了那个七八年之后，就这个人就出现了。而且我就...我觉得好像也是命运，我也觉得很难用什么理性的东西来分析，我怎么就让我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没...他也是一个非常平和，没有任何控制欲望的一个男人。所以我的朋友给我的一句评价我就认为是以...是我引以为傲的，是我的女性的朋友给我一个评价。就是说你是我们认识的唯一一个结婚和没结婚没有区别的人。你像我们的女性朋友，女伴们，是吧，到了结婚以后就约不出来了，有至少四五年，你晚上再让她出去喝酒、看电影、或者到人家去聚会，就今天晚上就住那儿了，不回来了。结了婚的女伴就约不出来了，单身的时候可以，没朋友的时候可以。而我，任何人随时约随时到，而我家先生.....你知道他反而会跟我说一句什么话？‘如果远，你就别回来了，因为我怕你在路上不安全。’他从来不是说那种你必须八点钟之前回来啊，或者说你要不然就甬去了。而是他相反的他是说‘如果远，或者晚了，你就别回来了。’

张：他受过这个性别培训吗？

葛：他没有，他没有。我觉得他是一...他的...他的性情...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男人，他不是以控制别人和去影响别人的生活为乐的那种人。我觉得可能就是命，可能就是命，或者呢，可能呢，就是说其实我选他的时候，我还没成为女权主义者呢，我还在压抑当中呢。所以呢，我当时还...就是说觉得有点失落呢，好男人都来找我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嘛，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他的价值，而且觉得，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有很优秀的素质。他没有受到就是中国...这种文化的这种污染，也难能可贵，他是在中国本土上长大的呀。(笑)他真的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平和、平等的这种行为方式，而且他...他从来不会控制我。

所以我觉得就是也很...也很幸运，包括我到这儿来找这份工作。也是，我觉得各方面都蛮...我们快毕业了吗，然后各方面都满足我的那个需要，就是一看‘广州’，工作地点‘广州’。我当时在网上发现这个工作机会的时候，我...他躺在床上(笑)我们俩都在美国，同时，然后，

我...我就...我就觉得这个肯定不能考虑的，我就觉得要不然那个家都不像家的样子了。我倒不是出于那种小女人的那种考虑，但是，我觉得，家嘛，应该两个人在一起，你像我到美国，我先生都陪着我一块儿去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是很大的遗憾。然后，但是我先生躺在床上，跟我说了一句话；‘如果这个工作是你喜欢的，你不要因为我而放弃。’然后，我就说，那好啊，那我就真试了。然后我就开始写...写那个申请信，开始寄简历，就坐在那儿，我坐在那儿，他躺在床上，是夜里十一、十二点，我才在网上发现了这么一个工作机会。然后，我就过来了，我们俩依然就是感情还可以吧，然后就很多人就问我‘呀，你怕不怕他离心什么的’，但是我想一个是因为像他这种性格不是今天女孩所追求的，是吧？就是说他可能在传统的眼光里面，他不是个很有血性的男人。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什么培养了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性别观念，男人就一定要是有血性，是那种主导型的，是中心地位，女人只是他们的一个附庸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命，就...就让我遇到了这样一个男人，而且.....其实后来在我先生追求我的时候也有一个博士，就是我们当时就住在社科院吗，一个单身宿舍里面。然后，也有一个博士，他也对我...就也来找我，尽管最后没有那个明确的表达吧，但是我也知道他对我有意，不然他也不会，每天晚上，我一下班他就到我那个宿舍来找我聊天。但是我呢，当时就是在福特基金会上班嘛，住在研究生院的那个单身宿舍，然后呢，就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单身宿舍。然后住在那儿的人一般晚上是在食堂吃饭，但现是我下班以后，回到这儿以后，食堂的饭已经卖完了。所以那个博士来找我聊天儿的时候常常是我在煮方便面的时候，他已经吃完晚饭了，然后就跑我房间来聊天，我就会一边煮着方便面再加两根香肠，一边给他聊天。然后，博士就会说；‘你在福特基金会工资挺高的，你就到馆子里面去吃吧，你干吗自己煮方便面呀？’然后呢，我们家先生呢，也有的时候来找我，然后也看到我在那儿煮方便面或者是在热饭呀或者什么的啊，弄一小电炉，还是违规的，得躲到房间里用。然后，我们家先生就会说‘以后我给你做饭吧。’说那个；‘我呢...’因为我先生是回民，他说‘我呢也不太愿意吃食堂的饭，反正



我一个人做一份也一份，我做两份也是一份，我看你晚上老吃不上饭嘛。’说‘那我以后就做两个人的饭。’

你看这...这人就比较出来了吗。可能博士今天已经当了教授了，当了学者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女人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怎么来关爱你。所以我就这两个人当中就选择了后者，（笑）就选择了那个给我做饭的，而且我先生是一个...就是非常重承诺的人。他说他给我做饭就一直给了我做了一年多，一直到我们结婚，然后他接着做。所以，尽管我先生可能今天在工作上面呀，在社会成就方面一般。但是呢，他对我的...就是这种感情和对我的关怀是从来一天都没有变过。而且这种...就是非常高境界的关怀，他关怀到我的空间的需要、关怀到我的职业发展的需要。他从来没有以他的需要为理由而让我放弃需要，我觉得这样一个男人是非常值得.....就是我能遇到这样一个男人是非常幸运的。另外我的先生非常的...长得非常漂亮还...（笑）

张：那您有没有想过就是传统的女性角色，做饭哪，收拾房间哪，温柔啊，体贴呀和现在女性的这种主体的这种自我、自主，这种体贴有矛盾的地方吗？如果有你是如何处理呢？

葛：我觉得没有矛盾。因为做饭、洗衣服、做家务，这是我们生存所必要的。但是我们有二个角色，我们是一个私人生活领域的角色和公共生活领域的角色。当我...就是说我们作为女性，我们有责任把私人生活领域的角色和公共生活的领域的角色把它协调好，完成好我们这两个角色。我不能接受的是因为私人领域的这个角色的需要而要让妇女放弃她在公共领域的角色。这是对妇女不公平，没有人有权力让我们放弃，包括你爱的人和爱着你的人。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这种人以爱为理由让女人放弃很多东西，我觉得这种爱是不健康的、是霸道的。而现在的很多的妇女被这种东西所迷惑着，我为我一个所爱的人，我什么都值得做。这是什么文化嘛！为什么我们的文化要建立一个牺牲上面，幸福要建立在某个人的牺牲上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又回来...就是说男女在私人领域有承担...共同来承担这个责任，这

个角色的责任。凭什么把私人领域的这些角色和责任全都推到女人，这样的男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公共领域而让妇女牺牲掉我们在公共领域的角色。( 停顿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也要讲究平等，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也要承担责任。一个...我觉得只有一个公平的关系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不然的话，女人就会受到压抑呀。我可以做，年轻的时候我还觉得是爱的梦想和...和一种浪漫的这种幻觉，我觉得我心甘情愿的做。你想有做一辈子的女人，完了以后在外面一事无成，她能心甘情愿吗？我觉得没有，如果她心甘情愿的话，那么，她已经被完全的压抑掉了。而美国的妇女运动，中产阶级妇女为什么有那种叫“女性的奥秘”的什么什么，她就有一种说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愤闷和压抑。六十年代那个贝蒂·佛里丹那一拨女权主义是一帮中产阶级妇女呀，她们跟他们的丈夫一样上了大学，但是她们一生孩子就在家呆了，呆了以后她们就觉得被压抑了嘛。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但是她不快乐，有钱、有安全、有保障、有幸福，可能她们的先生也很爱她们。但是她们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压抑、莫名的东西在冲撞着她们的心灵。直到有一天崩泄出来成为新一轮的六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她们要找回她们失去的另一块生活空间，就是公共空间。

当...一个人...我们是社会人，我们不可能就是对我们完全脱离社会生活而没有感受。那如果我们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被压抑掉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要暴发，这也是一种压迫，我们的选择受到了限制，而因为...仅仅是因为我们是女人，不是因为我没有能力、不是因为我没有技能、不是因为我没有眼光。这不就...性别不公平吗？那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一定会暴发，她一定会不满。这不就是又一场革命的前兆吗？所以我还是要质疑，就是一个社会为什么要建立在一个不公共的这种秩序下面。为什么我们要让某一个人群，仅仅是因为她的性别、或者因为她的阶级、因为她的出身...她就要放弃，天然的要放弃一些东西呢？这就是“社会公正”啊。而且当有一些人，她们放弃的太多的时候，难道不是人类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吗？

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要建立在一种这么不理性、不合理的一个秩序上？以...某些人的发展为为什么要基于一些人的完全不发展上？不要看有些男人做到了 CEO，做到了省长、县长的，他们的这个进步是以有些人的不进步作为代价的，我就要质疑这种发展模式。（沉默）

张：那您现在的工作...现在的组织当中有没有显著的性别分析的渗透，或者链接和体现？

葛：这个呢，就...也有，是在一些...也是在很微妙，很多很微妙的情况下。嗯，就是因为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在中国的项目还没有完全开展。但是...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工作主要是给那个在工厂的工人提供一些培训，也包括给那个工厂的管理者，就是外资企业的那个管理者提供一些培训嘛，所以呢，我.....就是现在也是很注意我们的培训者，应该是男女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团队。另外，比如说我们的培训教材，应该是个性别平等的，这种...理念的这种教材。另外，我们的受训的对象，我也会让工厂看到，就是说，如果男女都能来参加这样的培训，可能对中国工厂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还有一点呢，是我们比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有优势的，就是我们的工人的构成是百分之八十是女工。因为我们是一个劳动力型的产业，所以百分之八十是女工，所以你再处心积虑的，想不让女的来，它也有一个百分之八十的这样一个构成。所以就是说我们给工人提供培训的这个机会，就是这种项目、活动。女工参与的机会是很高的，但是呢，就是我们给管理者提供培训的这种项目，那么就是男的偏多。工厂，就是这样的一个金字塔型，越往下女性越多，越往上男性越多，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那么我现在呢，也只能是利用我的个人的影响力。比如说，平常和工厂的管理者，高层次的管理者有时间接触的时候，我就会让他看到，就是说在一个百分之八十是女性的一个行业当中，如果你的管理者——女性，也占相应的比例的话，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女性可能更了解女性的这种生产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她可能更能和女工来沟通。当然我只能是用这种东西来潜移默化地去影响这个工厂的管理者，但是要和他们根深蒂固的这种性别偏见做斗争的话，可...也是有很长的路要走。

葛：我做事的原则就是我从不刻意创造机会。我只等待机会，就是说我只等这个机会成熟，但是我会充分的用好每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不是野心家，而且我不会因为我自己边缘化而感到难受，因为我没有太大的欲望。我没有权力欲望，实际上。我没有钱的欲望，呃，就是当然钱的欲望有，就是我自己通过我自己一份勤劳的那个劳动，我从来没有从任何的项目上面去弄过钱。我从...就是在那个方面我没有钱的欲望，但是我自己有着很强的挣钱能力。比如说我现在这份工作我的薪酬就很高。所以我呢，就是说，我是这样一个人，我不会去刻意的去做任何事情。

张：但是一直也在做。

葛：所以我...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刻意做的，都是水到渠成。比如说我在福特干了五年，我的那个老板就把我介绍到联合国开发署，在联合国开发署就自然而然的做了这些事情，有了这些机会。正因为我做了这些机会，这个托尼·赛奇，才把我介绍到哈佛去读书。有了哈佛去读书，我找到了这份工作。但是没有一个是我自己刻意追求的，没有。我，我，我就不会刻意追求任何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一个人的努力、一个人的诚心会让机会来找你。如果机会来了，我会把这个机会用的最好。我想，我想这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

石：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西方女权主义那个...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一块国土，您觉得遇到了哪些冲突？就是这个...哪些阻抗？您怎么看这个？然后，就是作为一个...推动中国女权主义的这个先行者，您这种推动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您怎么看您作为女权主义者？

葛：我觉得就是说，女权主义理论被引进到中国受到这个阻...阻碍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就是因为女权主义是一个要改变结构性的，这样的运动和理论。那么，它当

然要挑战既有的秩序的既有的权力关系。你想想看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呀，怎么会不受到阻碍呢？而且它这个挑战是多...多方位的挑战。因为它挑战既有的就是政治秩序，因为它讲到的是平等吗，而不是少数人的政治垄断嘛。它挑战的是一个政治秩序，挑战的是两性的权力关系。那么在这...那，那，你想，任何挑战它都会受到阻...阻力。因为当你要让既得利益者，放弃他一部分权力的时候，他不会痛痛快快的。这种挑战还有一个意识形态的挑战，就是意识形态的...他在意识形态上和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不一样的。所以，主流意识形态者当然也不接受它，所以这个非常正常，正因为它的革命性、它的政治...先进性、它的...就是这种...什么...就是...那个颠覆性，使得很多人等了解它了以后，谈虎色变。开始抗拒它，所以这个恰恰反映了它的革命性、它的先进性、它的这个挑战的力度和它的颠覆性。所以我觉得非常正常，非常正常。因为任何一次...就是这种社会的进步，这种文化的变革，它意味着要让很多人放弃利益。有情的或无情的，没有人是会愿意自觉自愿的放弃利益。小到家庭、男女关系，大到国家。所以非常正常。那么作为我个人我不会因为这种阻力而放弃，而且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有这种阻力，才说明它有价值。

石：那...就是需不需要把西方的女性主义本土化？（笑）

葛：这个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了，真的我觉得我...我...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把人类的一些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划出区域和划出那个...和划上区域的和划上国家的、民族的这样的符号。我判别的标准是看它符合不符合我的需要。我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是一个有生命价值的人。这是我的自我认定，那么，哪...我去拥抱哪个理论，我是...或者拥抱哪一种主义，我是看它对我追求我的这种价值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还是一种压制的力量。如果它是能够释放我、解放我、让我实现我的这种价值的话，我不管它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都会拥抱它。而且我认为就是人的这种需要发展、需要平等、需要别人公平对待，这种东西不分东方，西方，是我们生命的本能。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为什么要限制我的选择呢？我绝不

会因为它西方的我就不要它，而它对我的这种个人追求是有利的。我的价值，它跟我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我为什么是...仅仅因为它是西方的我就要放弃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也不存在着把它本土化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就是人类的一个...今后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希望，也是在于我们有共同的、最基本的人性。我绝不相信有的人他会天然的去拥抱压迫、不平等、等级制和自我否定、自我排斥。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去...去主动的去拥抱东方的这种专制主义和这种等级文化的话，是因为他已经被这种专制和这种等级文化异化了，不是...我觉得这不能说他的人性的本质和他一种自觉的追求。如果你给他一个选择，你看他会追求什么？这种选择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很多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没有选择。我觉得我希望得到选择，而且我自己是选择的主体。所以我不限制我自己的选择，我...因为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希望这种选择是我完全自主的。

我觉得中国的女权主义，我觉得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自觉的发掘自己的资源和总结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价值。我不能认同的是在你不做这个工作的前提下去盲目的排斥谁，但是我也觉得去梳理我们自己本土的这个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工作现在并没有在扎扎实实的做，而是更多的人把这个精力放在了我要去否定别人。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我去拥抱西方的时候我并不否认我们本土有价值，问题是你给我总结出来呀，你给我现成的写好放到这儿，给我一个选择，给我做比较啊。我现在个人体会到的是我们本土的这种价值是对我的一种压抑和剥夺的过程啊。除非你...你把它总结出来，你像女权主义，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一样，给我这么系统的、丰富的这种理论的财富，你给我放到这儿。你让我去选择，那我当然哪个对我更好我会选择谁呀。问题是你为什么没有做这些梳理的前题之下就否定别人呢？而别人用了二百年总结出了这么丰富的这个文化财产、文化财富、精神财富、思想财富，我们为什么就仅仅是因为它是西方的，我们就要...要否定它呢？这是一个诚实的结果，结论吗，这是一个...一个诚实的过程吗，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吗。这是我要质疑的。我认为的是不理性的过程，

我还真不怕别人说我是卖国...卖国贼，因为我理性的，我觉得。而且我是自主的，我是有尊严的，而且我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就包括我不希望任何人来限制我的选择，而且任何人不要在我面前贴标签，仅仅是因为民族的，这个文化的、或者地域的东西来限制我。我觉得我是用我的生命的一种本质来追求某种东西或拥抱某种东西。

张：您走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怎么样评价自己？

葛：我觉得我很幸福。我觉得我很幸福。

张：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很幸福。

葛：很幸福。我非常幸福。就是还是这个啊，我觉得我很自由啊，没有人可以限制我。这种自由是我身体的自由、我精神的自由。我，我，而且我是自主的。没有人可以来让我做...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违反我的意志让我做什么。就是说我有自主的这个能力，我做的事情都是我愿意做的，是我想做的。

张：这个推动整个中国的这种女权运动过程当中，您怎么评价您自己？

葛：沧海一粟了，(笑)我那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评价，只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更大的是我是受益者。我首先定位于我自己是个受益者，我的受益是我被解放出来了，然后因为我受益了，所以我才参与，是一个参与者。

张：非常感谢。

葛：哎哟，我也...我也是一种宣泄。(笑)

——完——